

# 当前中国阶层流动固化趋向与治理路径分析

## ——基于集团分利视角

张群梅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阶层流动以精英流动为主要实现方式,精英流动受阻意味着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是集团分利的后果之一,是“机构僵化症”的同义语。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各类精英集团,精英集团的分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集团式垄断,而阶层流动又以资源占有为前提,精英便趋于集团内或集团间复制,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实现公平分利以建立良性精英流动机制、适度硬政权建设以打破分利集团联盟及制度变革与创新以重构利益格局是消除阶层固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阶层固化;精英流动;集团分利

**中图分类号:** D663;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12)03-0034-06

**收稿日期:** 2012-01-05

**作者简介:** 张群梅(1973-),女,河南三门峡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社会学意义上,阶层流动是指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间的变动,可分为向上向下两种流向,其中,向上流动的质与量反映着阶层间的开放程度及下阶层突破上阶层边界的难易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流动机制逐步地实现了从国家选择向社会选择、从一元模式向多元模式的多重转变,阶层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但近几年,由于改革过程中利益分化的加剧,推动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向上流动的力量明显弱化,阶层流动呈固化趋向。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社会学界就开始关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并进行了比较充分地研究,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判断,即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sup>①</sup> 这些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及阶层流动状况,针对所存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虽然解释模式不同,但在这三种判断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目前中国的阶层流动趋于固化。

对于阶层固化问题的研究,理论界多是从宏观层面对其现状、危害及对策进行整体性论述,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平正义、制度、资本等因素的

分析,<sup>②</sup>而从集团分利视角来研究阶层固化的还不多见。

引起中国阶层固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中,分利集团及其联盟的存在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因。分利集团的投机性、排外性与封闭性造成了资源的集团式垄断,而社会职位对资源占有的要求又要求精英以占有资源为前提,因此,中国的社会精英发生发展机制已由常态循环逐步地趋于集团内或集团间复制,精英复制必然导致阶层固化。阶层间良性的流动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协调机制,阶层固化一旦形成,将会加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将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一、阶层固化:“机构僵化症”的同义语

阶层固化是指社会各阶层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一种流动受阻现象。“机构僵化症”是奥尔森集团理论中一个专门用来描述

<sup>①</sup> 严海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新变化的政治分析》,《江淮论坛》,2006 年第 4 期。

<sup>②</sup> 参见朱宏军:《社会分化中的社会公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王文龙:《制度缺陷、逆淘汰与阶层固化》,《吉首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集团分利后果的学术用语,表示一个国家由于分利集团联盟的存在而导致机构之间流动停止,最终导致国家衰落。阶层固化的实质就是阶层僵化,是“机构僵化症”的同义语。

“机构僵化症”的产生是以分利集团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的。集团的功能在于提供准公共物品,即布坎南所说的“俱乐部公共物品”。由于产品的生产是集体的,但消费时个人必须付费,所以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成分与私人成分双重特征。私人成分决定了集团具有排外性,也就有了排外性集团或分利性集团的存在。正因为集团能够提供个人实现不了的公共物品,个人加入集团的动机就是要增进自己的利益。集团在实现增进成员利益的功能时,往往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通过努力增加全社会的总利益,从而增加自己在总利益中的份额;另一种是在社会总利益中为自己的成员努力争取更多的份额。当采取第一种方式时,集团的成本与收益是不相符的,因为,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一个利益集团,不管其规模多大,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单个集团的努力实现社会总利益增加时,它不仅要独自承担全部成本,而且无法排除其他集团从中受益,自己仅能获得其成果的一小部分。当采取第二种方式时,把本用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成本用来为自己集团争取更大的份额,自己集团的收入确实增加了,但社会总收入却因此而减少了。经验表明,集团均倾向于用第二种方式为自己成员谋利益,这种倾向被称为“分利”。分利集团只代表自己的成员,只关心从社会总利益中谋取更大份额,而不关心社会财富的增加与否,“即使社会利益重新分配,所招致的损失超过该集团由此种重分配所得利益的许多倍,仍会发生上述情况”。<sup>①</sup>

分利性导致了集团的排外性和封闭性。分利集团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在总量上固定并只对本集团成员开放,因此,为保证成员收益不减,同时避免消费公共物品时出现的拥挤现象,在集团成员人数能保证集团行为成功的前提下,集团往往会坚持最少数目原则,倾向于控制规模,对新成员的进入设置壁垒,即所谓的“集团边界”。经济上,各类行业协会建立寡头垄断,倾向于限制新成员进入本行业;政治上,掌权的政治寡头则往往建立种种壁垒,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与平民相区别。正是由于分利集团的大多数活动都致力于创造和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极端强调再分配目标产生的预期后果,所以,导致其活动倾向基本都在效应可能性边界上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分配点,而不是把这一边界向外移动,久而久之,便

造成机构僵化,阶层固化也随之出现。

精英流动是阶层流动的主要实现方式,合理有序的精英流动符合阶层流动的常规,并进一步推动阶层流动正向发展。阶层固化则是阶层流动受阻的一种反映,是精英流动非良性发展所导致的后果。精英流动是否正常合理,主要取决于精英的发生发展机制是否正常合理,而精英发生发展机制莫过于循环和复制两种,循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复制则意味着阶层间流动停止,即阶层固化。

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产生于非精英群体的过程。精英以能力为基础,可指在人类活动领域中取得突出成绩而达到较高层次的所有优秀人物。一个社会中,能力水平越高,处于该水平的人就越少。当能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那些“拥有高分的人们”便形成一个精英阶层。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所有在能力上拥有高分的人都能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超凡能力的人总是不断地寻求确认和增加他们的社会地位以成为高层精英;而在精英层中,正好呈相反趋势,旧式精英越来越不适合统治。于是,处于下层的具有更高水平的人开始崛起,并挑战上层精英。慢慢地,下层中优秀分子聚集,上层中低劣分子聚集。这种情况使原本存在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从而成为破坏社会平衡的重大动因。为了达到平衡,就需要精英循环:下层优胜精英进入上层,上层低劣精英淘汰至下层。精英循环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平衡,由于社会发展必然要遵循着某种程度的平衡,精英之间发生某种循环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但在精英循环过程中,旧式精英与新式精英往往存在着权力之争。在旧式精英早已编织好的权力网中,其经济的、政治的资源远超平民精英,下层精英无法进入已经固化的权力网中,精英循环就会因之受阻而变得缓慢乃至停止。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发生机制不再是各个阶层间的有序循环,而是复制。

精英复制是指精英群体的自我再生产过程,它与不同阶层对资源的占有程度、集团的分利化倾向有着密切关系。阶层流动与资源相关联,因为,阶层流动意味着人们从此位置变换到彼位置,而位置与位置间所包含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是不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阶层流动的实质就是资源占有情况的改变。没有资源是不能实现流动的,位置本身对资源的要求,也要求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资源才能够取得相应的社会位置,否则,阶层

<sup>①</sup> [美]曼·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8页。

流动将会变得无序。既然阶层流动的实质是资源占有情况的变化,那么,资源占有情况公平与否就直接体现了阶层流动公平与否。资源占有量越大,相应社会位置就越容易获得,而位置一旦获得又会使获得者获取更多的资源。在占有资源的对比中,个人占有份额总比不过利益集团所占有的份额。利益集团的分利化倾向会使他们对各种资本加以垄断,以便从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利益,而且分利集团的排外性使集团外的人难以共享集团利益,家族式或联盟式的延续便是必然。当财富与资本以家族式或集团联盟式延续时,资源占有的优势方总会是已存的上层精英及其后代,下层精英由于对资源占有机会的缺乏而无法进入上层,精英的发生机制便由循环走向复制。正是职位对才能、财富、权力、关系等资本的要求及利益集团的分利性质使这些复制的精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上层位置,哪怕他们根本称不上高素质人才。而处于下层的精英虽有才能,但因为缺乏其他的资本支持则无法进入上层,于是,上层的固守上层并日益显赫,下层的滞留下层并日趋恶化,以才能为主的社会流动自致性规则逐步弱化,最终导致阶层固化。

精英循环、精英复制、阶层固化与集团分利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精英循环通畅表示阶层流动正常,阶层固化不会出现;一旦精英循环受阻,出现精英复制则必然导致阶层固化,且复制程度与固化程度呈正比例的恶性循环关系,一方的加剧势必引起另一方的恶化,而导致精英复制的重要诱因正是集团分利。精英的正常合理流动是维持社会稳定、消解阶层对立的必要机制,保持精英流动渠道的畅通无阻是保证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因此,阶层固化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各阶层间的精英流动处于常态,而精英流动处于常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遏制集团分利,打破分利集团联盟以消弭精英复制。

## 二、精英阶层分利倾向与精英流动受阻: 中国阶层流动现状分析

经济学假设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案,而集团则是个人获利的有力保障。于是,人们根据自身的财富、权力水平,随着新的制度变迁,成为了某个集团的成员,这样,在多个同水平利益群体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新的阶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驱动的利益分化过程中,催生了一批利益群体,也导致了分利阶层的出现。

中国的利益分化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它使同质结构的农村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角色群体大量涌现。到80年代中期,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提高,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城乡利益分化。同时,城市也在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上出现了体制内分化与体制外分化,且体制外的分化占社会利益分化的主导地位,并引领和诱使着体制内的进一步分化。总之,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利益分化都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权改革、不同的教育层次等基础上产生着各自的利益群体。在这些利益群体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中,新的精英集团开始形成。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阶层的划分应该由多维因素来决定,应该包括财富、声誉和权力等决定因素在内。<sup>①</sup>布迪厄也认为人们应该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三种资本去竞争自己的社会地位。由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精英分为三部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在一阶层所占资源各不相同,其中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占明显优势。

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政治精英中的许多人在原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结构中占有一定权力位置。从转型期精英更替模式中可以发现,我国的党政干部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某些特殊原因极不情愿地退出原有优势集团,绝大多数通过原有政治资源的‘巧妙’转型及原有社会优势力量方便地获取了进入市场的机会”。<sup>②</sup>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是改革开放后在技术官僚化过程中进入了政治精英集团。

经济精英主要由国家银行及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营企业主等组成。经济精英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与政治精英有亲密关系,甚至有些人就是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实际上,精英的主体在改革开放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不过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精英。当然,经济精英中也有一些群体是通过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这在高新技术行业中较明显。随着阶层意识的形成,经济精英的利益诉求已从操纵经济生活逐步向控制政治决策转移,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县以

<sup>①</sup>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sup>②</sup> 刘晓凯:《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下党政核心领导层,精英阶层利用金钱来操纵政治活动的痕迹已非常明显。

知识精英的形成路径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有所不同,而且阶层利益分化相当严重。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建设着重于人文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较高地位。改革开放后,科技知识及一些与经济建设、生活转型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成为重要的文化致富资本,一些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等成为相关机构的领导人,一些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层。这部分知识精英成功地把原有能力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极大地拓宽了资源占有渠道,通过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利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寻租行为,取得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利益,成为了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中并未得到多少利益,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这些人开始质疑改革,导向也越来越趋于利益。

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无论哪一类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讲,精英集团的形成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精英集团的存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关键是这些精英集团所具有的分利化倾向,他们惧怕权力丧失和利益弱化,在拥有现存资源的前提下,形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将他们都固化于此阶层,并得以家族式复制与延续。外界新人特别是平民阶层由于缺乏资本则很难进入此网,精英与非精英间的“围墙”便赫然呈现。阶层固化必然导致精英循环受阻,而精英循环受阻又使阶层固化加剧。

关于当前中国阶层的发展状况,学术界大致有三种判断: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碎片化指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而呈无序状态;断裂化指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结构断裂使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指社会群体横向流动通道相对畅通,而纵向流动通道却被阻滞,阶层之间界限分明利益交流困难,其结果就是阶层关系固化。<sup>①</sup>其实不论哪一种判断,都说明中国阶层之间发展的非正常状态。社会纵向流动通道日趋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精英发生发展机制已由改革初期的精英循环为主转变为精英复制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模式变化,促使了中国阶层多元化的出现,其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分化迅速。到90年代中后期,阶层分化速度趋缓,阶层状态已基本定型。这一时期的阶层分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无可厚非。但受到精英集团的分利倾向及中国在改革

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制度缺失等诸多因素影响,加之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及制度变革与调整动力减弱,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开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渠道,难以共享发展成果,难以实现公平、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而且这种状态在以后多年内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改善,反倒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精英复制、权力世袭现象尤为突出,阶层固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往,人们信奉“前程向人才开放”,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有所作为,成为上层精英,而如今,家庭背景则成为决定个人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个人成功不是取决于个人能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其家庭所处的阶层地位,即取决于父母的行业、单位、职位性质及家庭社会资本的多少。在这种背景下,处于社会下层的子女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以获得阶层提升,而处于社会上层的子女利用先天的社会资本优势,以及对资源与权力的双重垄断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几乎垄断了所有优势行业的就业机会,从而造成权力与财富的世袭化。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高达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比例占26%。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仅占2.8%。<sup>②</sup>而且从不断曝出的公务员招考的“量身定做”、“萝卜招聘”等丑闻中我们也能对当前阶层固化状态略见一斑。集团分利及分利性联盟的存在导致了精英复制与权力世袭,进而导致了阶层固化,打破分利集团及其联盟已是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 三、打破分利联盟、建立良性精英流动机制的路径选择

良性精英流动机制就是使高素质者能够进入上层和低素质者能够被淘汰出精英集团的机制。从集团分利所造成的精英流动受阻来看,打破分利联盟、消除阶层固化、建立良性精英流动机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实现公平分利是建立良性精英流动机制的基本前提。自改革以来,财富的社会构成状况和分配机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与改革前相比,公民的个人财富积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财富的

<sup>①</sup> 蔡志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速,纵向流动通道渐狭窄》,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7/3138497.shtml>, 2011年6月27日。

<sup>②</sup> 黄骞:《必须消解“阶层固化”的隐忧》,《中外文摘》,2011年第6期。

积累速度与分配公平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状况。中国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富裕程度在全社会的公平而合理地扩展问题,致使一部分人由于先富所带来的契机而越来越富有,进而以集团或联盟形式进行各种资本垄断,而大部分人由于后发劣势则与富者差距越来越大,难以分享改革成果。虽然法律规定人们机会平等,但机会的实现总是需要资本或资源为基础,没有一定的资源占有就不会有真正的机会平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分配正义,是指社会基本的福利、利益和物质成果在人们中间进行分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认为,机会平等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它必须可以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而真正拥有平等的机会,就必须保障机会平等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如防止产业和财富的过度积聚,保证所有人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德沃金曾提出“资源平等”概念。“资源平等”虽然是指社会只提供人们正常生活所需要的资源,个人应该对这种资源转化为个人福利负责,但前提是个人首先要占有一定的资源,资源平等才能要求人们应对平等的环境,从而以优胜劣汰方式决定进入上层还是被淘汰出局。邓小平改革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政策设想是包含手段与目标两重性的,且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其中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实施手段的最终决定因素。当先富起来的人们与尚处在贫困状态的人们之间因“财富正当性”与“财富原罪”的认识分歧发生对立乃至冲突时,当具有调节贫富状态的国家职能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时,因无法共享财富增长好处而导致的分利不公问题就会逐渐演变为阶层、集团间的对立抗衡等政治问题,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公平分利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诉求,建立公平分利机制,使富裕程度公平而合理地扩展,以实现人们公平分享改革之利,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消除特权集团资源垄断、建立良性精英流动机制的基本前提。

(二)适度的“硬政权”建设是打破分利集团资本垄断的有效手段。“硬政权”概念由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最早提出,它与“软政权”概念相对应,指的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中心的两种不同的权力运作能力。“硬政权”指在政治运作方面具有明显的社会整合效能,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战略的宏观导向性。“软政权”则指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退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法律规则被随意破坏等所引起的综合现象,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第一,“反法制的互利性”,即社会成员

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金钱等,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的私利进行交换;第二,对法规的遵守与解释的松弛性与随意性;第三,它对包括下层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渗透性和普遍性;第四,贪污、腐败等各种属于软政权的行为模式彼此的互诱性和积累效应。<sup>①</sup>

在习惯思维上,人们往往将“硬政权”概念与“权威”等同,而“权威”又常作为“自由”的对立面被人们贬斥。其实,无论是自由、权威还是“硬政权”,都讲究一种度,而且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政府权威衰落的时候,我们要树立政府权威,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特殊、情况复杂的国家里,一旦没有了权威就没有了秩序,也就没有了稳定与发展。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曾讲过一句话:“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sup>②</sup>也就是说政府首先要具有权威性,即有效性,然后才是有限性,适度的“硬政权”建设是政府实施统治的权力保障。

由于改革前的集权式体制存在弊端,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开始便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市民社会、市场化企业与地方自主系统的发展,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便出现了一些脱序或失范现象。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官员与民众之间,在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方面以及在彼此协调关系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国家权威面临着种种挑战。其实,分利集团的出现及逐步强势化正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权威衰落所形成的“软政权”的结果。软政权与分利集团之间呈恶性循环状态,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失范的两个不同侧面。中国在改革初期,由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享有传统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吸纳从国家垂直控制下脱离出来的资源的能力远大于市场吸纳这些资源的能力。于是,一些个人与政治势力便利用其拥有的传统政治资源取得从国家控制中脱离出来的利益,并利用这种利益进一步坐大,形成新的势力范围。正是社会成员间存在的这种“权钱交易”等“非法制的互利性”的软政权行为模式,成了分利集团形成的重要途径。由于分利集团运用特权取得利益所花费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远远小于自觉运用市场

<sup>①</sup> 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sup>②</sup>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4页。

机制所取得的平均利润,因此,集团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利用自己既得的各种资源通过垄断等手段非法地获取新的更多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导致软政权化。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分利集团与中央权威较量的现象,中央从大局出发所制定的政策在地方权势集团那里往往得不到真正的落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中央与分利集团之间时有发生。分利集团的贪婪性与垄断性,使它们根本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全体人民的福祉,成为了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毒瘤。而对分利集团的制约,个人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国家以其强制性权威来加以限制、消除。适度的硬政权建设,是打破分利集团资本垄断的有效手段。

(三)制度变革与创新是重构利益格局的重要保障。遏制分利集团的分利性扩张,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有学者将中国阶层固化的原因归纳为:所有制结构变迁引发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双重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条件下采用的倾斜性政策遭遇调整困境;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多元价值主体加大了政府协调社会的难度。<sup>①</sup>以上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由最初的制度变迁逐渐转换为制度的路径依赖,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非良性依赖。

制度形成后的自我捍卫和强化机制必然引起路径依赖,这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不同的路径依赖发展方向,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良性的路径依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恶性的路径依赖却会在初始制度报酬递增消退后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尽力维护它,从而使制度变迁进入“锁定”状态,社会亦陷入无效制度困境。改革使中国发

生了大范围的制度变迁,新制度的出现给予中国现代化发展以巨大动力,社会也随之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先前的某些制度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便是必然。但由于制度变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较量。利益受损者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以从中获得利益补偿,利益既得者面对新制度出现可能导致的利益弱化,往往会千方百计地阻碍制度变革,哪怕这种制度根本无效率可言,其中以既得利益集团为最。利益集团的强势性常使制度变革与创新成本加大而流于形式。

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sup>②</sup>与强势利益集团相抗衡的唯有政府,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能正常进行时,便需要政府用“强制性”变迁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制度变革与创新,打破分利性垄断联盟,重构利益格局,使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符合基本公平原则,形成有利于阶层成长与阶层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阶层间的常态循环。

① 蔡志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速,纵向流动通道渐狭窄》,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7/3138497.shtml>, 2011年6月27日。

② [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责任编辑 韩顺友)

## The Analysis of Class Mobility Solidification Trend and Governance Path in Current Chinese: Group Interest Perspective

ZHANG Qun-mei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Elite mobility is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of class mobility, elite mobility clogged means class solidification, a synonym of institution sclerosis, which is one of the results of group interest. The elite groups in various fields have form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arket, and group interest of elites leads to group monopoly of resources while social mobility presupposes the precondition of resource possession. So elites tend to be reproduced within a group or between groups and class solidification tends to be stronger. Achieving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o establish virtuous elite circulation system, moderately hard political power to disintegrate the alliance of group interest and system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construct a new interest pattern is the path choice of the elimination of class solidification.

**Key words:** class solidification; elite mobility; group interest